

编者的话

军人的婚姻,因其独特的身份而与众不同。为了祖国的需要,他们舍弃了与爱人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用超凡的毅力忍受着聚少离多的苦涩;为了国防的需要,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他们没能听到儿女呱呱坠地后的第一声啼哭,没能注意到爱人头上长出的第一根白发,只因他们肩上担着军人沉甸甸的责任……

面对家庭,他们将愧疚和感激藏于心

底。可我们深知,50年相伴一路走来,夫妇之间,已然达成了无言的默契、隽永的深情。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2014年上海市军休干部欢庆八一金婚庆典于7月29日在科学会堂举行,50对军队金婚夫妇成为人们视线的焦点。

今天,我们从《军旅人生 相爱随行——上海市军休干部金婚故事集》中,选辑3对夫妇的金婚故事以飨读者。



■前天,五十对军队金婚夫妇走上舞台,回忆与老伴携手走过的难忘岁月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军旅人生 有爱相随

——上海市军休干部金婚故事选



【相濡以沫 50 载】

张初康

我和老伴相识于1961年7月。当时,我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控制专业提前一年毕业,调往教研室任教。

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我在上海中学参军,当时仅有初中二年级学历。来到部队后,我靠勤奋自学,先后从步兵学校、空军预科总队、空军第八航校等学校毕业,又在航校任教四年,1957年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学二年级插班生。由于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我无暇顾及终身大事。对此,学校的领导对我关怀备至。那时候恰好我现在的妻子正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分配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经她的二哥、姐姐、同学与我系领导介绍,我们得以相识。我们的感情很快升温,可我从从事的是国家的绝密专业,所以相处很久她也不知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她聪明,知道问我也不会告诉她,但她在我宿舍玩时,注意到我书桌上常用的外文参考书和字典都是与火箭导弹等相关的,她心中就有数了,直到结婚也没再打听。

我们在相恋一年半后即1962年12月5日登记结婚。妻子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63年,我赴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执行任务,三个月不准通信、打电话。直到我完成任务回家,妻子都毫无怨言,给我的全都是关心和体贴。三年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随之,“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此后十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被拆散,我不得不脱下军装,跟随学院的主体内迁至长沙,在新成立的长沙工学院工作。当时的困境真是不可想象,我们一家三代五口人,我们夫妻俩加上分别为四岁和一岁的女儿、年逾七十的老岳母,住在不到8平方米的小平房内,晚上睡觉必须把门关上,再在桌子和箱子上架上一块板供五个人睡觉;上厕所要从窗口爬出去上露天厕所……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我又穿上了军装,继续为国防尖端事业拼搏。一路走来,我们夫妇相濡以沫,共度了五十多年的时光。现在我们回到故乡上海,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作者:闵行区军休中心二千所军休干部)



【当年她是“双尾舵”】

王根法

年轻的时候,身为飞行员的我,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着明确“计划”:部队规定飞行员须超过26岁才能结婚,我便计划24周岁找对象,理想中的对象是一名人民教师。无巧不成书,我家附近就有位姑娘在师范学校念书。1960年,24岁的我经人介绍和这位姑娘有了联系。她首先寄来了一封信,信封的背面写明了“内有照片,请勿折叠”的字样。战友们催促我赶快拆信,他们要看看上海姑娘长得怎样,心情比我还急呢。我刚把信拆开,照片就被战友们抢走了。他们一边看,一边评论:白衬衫、黑裙子、两只眼睛真漂亮,具有杀伤力。一个战友还大叫一声:“还是双尾舵呢!”(我们飞行员称留着两根辫子的姑娘叫“双尾舵”)战友们都说,我和她很般配,要我锁定“目标”。

此后,我们开始书信往来。每次回信,我都挑最华丽的词句。就这样“纸上谈兵”了一年后,1961年7月,在她毕业放假前夕,我请假回到上海,我们彼此才见“庐山真面目”。

经过两年的交往和了解,我们计划在1962年结婚。那年7月19日,她与我在部队招待所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婚礼。没有嫁妆、家具,两张单人床合并在一起,军用被子和被单一铺,就是我们的婚床。大队里只派了5位老同志参加婚礼,虽然简简单单,但我俩还是高高兴兴地圆了梦。

弹指一挥间,我们已到了“金婚”之年。半个世纪的牵手,50年的同心,从相爱、相知、相惜中,我们一路走来……

(作者:宝山区第二千休所军休干部)



【结婚历险记】

吴维生

如果将婚姻比喻为一棵树,我们这棵树如今可算根深叶茂。然而,我们婚姻的开端却是曲折艰难的。

1961年上半年,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当排长的我,经连队领导介绍,认识了一连连长爱人的姐姐刘玉兰。

那时,对军官的配偶在政治上审查严格。谁知,女方家庭的调查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她虽是共青团员,却出身富农。结果一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调查不对。当时,已调至营部当书记的我立即向教导员申诉:刘玉兰的妹妹是中农,怎么姐姐会是富农出身?教导员觉得有理,便请求团政治处再次外调。外调两次,结果依然相同。

倾心的恋情产生了伤心的裂缝。军队铁的纪律是不能违反的。我只得违心地给她写了一封长

信,求她忘掉我另找如意郎君。然而,我内心的痛苦却没有丝毫减少。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得到了领导的理解,同意让我利用休假到苏北如东县栟茶镇再去调查一下。

苏北是老解放区,1947年开始土改,刘玉兰家原先在农村,1949年二次解放后转为集镇居民。根据这段历史,我直接找到农业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叫沈成玉。说明由来后,一份证实刘玉兰家庭成分为中农的证明很快便开好了。至于为什么组织上两次外调结果都说刘玉兰是富农的问题,后来听说可能是居委会主任搞的鬼。

真实的调查材料交给了营领导,团部终于批准我们结婚,介绍我们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人民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

(作者:静安区千休所军休干部)